

李良志 著

烽火江南话奇冤

——新四军与皖南事变



烽火江南话奇冤

——新四军与皖南事变

李良志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

〔京〕新登字 04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李良志著.-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6

ISBN 7-80019-512-0

I. 烽… II. 李… III. 皖南事变(1941)-新四军 IV. K26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6553 号

烽火江南话奇冤

——新四军与皖南事变

李良志著

*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廊坊陆军导弹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25 千字 346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19-512-0

K · 155 定价: 18.60

前　　言

抗战时期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从发生到现在，岁月已流逝了半个多世纪，但这一事件并未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有关这一事件的真相，特别是其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功过是非、重要情节，仍深深地吸引着广大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研究兴趣似乎并不减当年。可喜的是随着党史研究禁区逐渐被打开，随着有关档案文献的陆续出版，及许多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的相继刊出，皖南事变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对事变发生的复杂历史背景已有新论，对事变的经过已有更详尽的叙述，对事变中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功过已有了较公正的评定，推翻了过去不少强加于他的不实之词，对他的死难之迷，已完全解开；有关叶挺、袁国平、周子昆之死，及对他们的生平评价，也已为人们所知晓和比较客观了。安徽省图书馆的陈枫同志所著《皖南事变本末》，不但较完整的叙述了皖南事变的前前后后，在政治上也不失为当前教育我们青少年的好教材。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的童志强同志撰写的《皖南事变研究十年》，对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皖南事变的研究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分歧，一一作了概述，为我们广大史学工作者所瞩目。最近，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新四军文献》、《新四军参考资料》(1、2、3)、《新四军回忆史料》(1、2)、《新四军综述、大事记、表册》，汇集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一定会把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台湾史学工作者对皖南事变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有的学者也敢于冲破过去国民党官方的老框框，对一些学者固执于过去有关评述皖南事变的陈词滥调不满，提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新见解。如台湾《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刊载了严锦教授的《皖南新四军叛变事件之经过》长文，此文虽也承认皖南事变是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幸事件”，但此文无论在内容上、观点

上都没有什么新东西，仍是 50 年前国民政府官方那套新四军在江南“不服从政府命令”，“游而不击”，“专打友军”，“自由扩张”，北移时又根据其所谓“三山计划”主动攻击政府军，实行“叛变”；顾祝同根据“军令、政令的统一”，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国民政府依法取缔新四军有理等等。不肖说，这些都不过是老调新弹而已。台湾的邓永发教授，对严先生的论文大不以为然，提出了几点重要的批评与质疑：第一，认为严先生没有参看近年来大陆学者发表的许多有关论文及出版的资料，因而论文缺乏新意；第二，对严文认定皖南新四军北移时是主动攻击政府军不表苟同，他说：“新四军是否处心积虑要向皖南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军挑战则大有疑问，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有意向国军挑衅，而是他们根本不信任政府在苏北黄桥惨败之后，会让新四军皖南部队按照自己片面决定的计划向苏南转移。”^① 第三，邓先生不同意严关于事变后，由于政府“公正无私，光明磊落”，因而“使舆论向政府一边倒”的论点。邓先生认为，这根本不是事实。他说：“在政府控制地区以外的舆论，大体来说，是害多于利，这在美国政界和华侨社会尤为明显。”^② 第四，邓先生也不同意严文中关于新四军在事变中“全军覆灭”，因而可得意洋洋的观点。邓先生说：虽“新四军事变对中共的打击很大，但并未到致命程度，就以新四军来说，当时皖南的新四军不过是全军的十分之一，处在国军的包围之中，本来就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如果让他们安全撤至苏南或皖北，当然对政府战后控制沪杭甬地区可能形成严重威胁，可是从抗战胜利后政府必须仰赖日伪军以确保沪杭甬三角地带的安全一点来看，我怀疑在皖南制裁新四军能替政府带来什么政治或军事利益。”^③ 在这里，邓先生实际上严厉批评了台湾某些人士死抱着的、战前的“宁亡于日，勿失于共”的叛卖性观点。

① 《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5 年版第 738 页。

② 《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第 738—739 页。

③ 《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第 738—739 页。

当然，邓永发先生对皖南事变的全部观点，与我们仍有很大差异，而且他的上述观点在台湾远未得到广泛赞同，因此海峡两岸对皖南事变的研究、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在大陆，今天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是否已不存在分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中，离开客观事实，杜撰了事变中的不少情节，对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心态、作风进行随意描绘，竟把项英这位有名的战将、功劳卓著的重要领导干部，写成飞扬跋扈、自私自利、怀有野心、搞“三山计划”、想做“山大王”，有朝一日与陕北平起平坐等等。史学界已有不少同志对小说提出批评，但作者是否能同意人们的批评呢？此外，事变中，皖南新四军最后的北移路线，到底是谁决定的，是不是项英的机会主义选择，是不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项英的功过，到底如何评价，他与王明究竟是什么关系？此外，还有对叶挺的评价，项、叶之间的关系，有关事变的复杂原因，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北移的策略指导有无失误等等，学者们仍在热烈地讨论着。可见，对皖南事变的研究，在我们大陆的学者中，争鸣也仍在继续之中，符合客观事实的结论有待分晓。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当我们隆重纪念这个伟大、难忘的节日时，我们主要应歌颂、宣扬我们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的民族觉醒、民族振兴、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正气；对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博大胸怀开辟两个战场、并肩作战、与日本侵略军血战到底的壮烈史实，我们尤应着重宣扬，以教育我们当代的青年和后世子孙，并告诫那些敢于图东山再起的军国主义余孽们。但是，皖南事变，它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刀杀的“伤痕是很深重的”^① 它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挑起内战的严重步骤，极大地威胁着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如果不是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相忍为国；如果不是海内外广大人民和国际盟友坚决谴责事变；如果不是国民党内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734 页。

有识之士迷途思返，悬崖勒马；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恐怕就会要曲折得多了。因此今天写此书，并不是偏爱旧事重提，更不是要对谁算老账；而是为了在学术上继续争鸣，阐述对皖南事变有关争论问题的一孔之见，在政治上则是要阐述历史经验教训，以推动新时期已蓬勃开展的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展望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在新条件下的民族凝聚和民族振兴，使我们祖国的统一大业早日完成。正因为如此，本书在分清是非曲直的同时，对事变后两党经激烈斗争后相互作出妥协，仍归旧好，共同抗日等，也作了叙述。伟大的民族抗战没有因皖南事变而夭折，这是国共两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相互作出的明智和冷静的选择的结果，这对于争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对民族革命的前途，可谓功德无量矣！

国共两党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两个最大的政党，两党的两度合作，都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历史证明，国共两党的关系如何，是左右中国命运的关键问题，对中国的前途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让我们祝愿对中国光辉未来肩负着重大使命的政治家们，以历史为鉴，加快国共再次合作的步伐，尽速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那些军国主义侵略分子、霸权主义分子永远不敢对我们再为所欲为。国共再次合作、祖国实现统一之日，必是祖国腾飞于世界之时。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新四军的由来

一、长征后的南方红军游击队	(1)
二、“持枪倚枕到天明”	
——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	(7)
三、下山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	(13)
四、何鸣事件与陈毅被绑	(20)
五、一支新人民抗日队伍的诞生	(28)

第二章 挺进大江南北

一、向皖南岩寺集结	(35)
二、到敌人后方去	(39)
三、“脱手斩得小楼兰”	(44)
四、新四军东进北上	(48)
五、刘少奇抵华中开辟苏北	(52)

第三章 项、叶之间与高敬亭之死

一、项英的早期革命生涯	(60)
二、征途坎坷的叶挺将军	(64)
三、项英、叶挺不和的缘由	(71)
四、高敬亭之死	(81)

第四章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一、国共关系的逆转	(88)
二、逐步扩大的华中磨擦	(96)
三、1940年的国共谈判	(100)
四、韩德勤败阵黄桥	(110)

五、曲塘和平会议	(116)
第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1940年秋的国际形势	(121)
二、委员长决意加剧华中磨擦	(123)
三、中共中央应付危局的决策	(127)
四、乌云密布中的《齐电》	(134)
第六章 新四军北移	
一、中共中央指示皖南新四军速移江北	(140)
二、项英的打算	(145)
三、延安对蒋委员长估计的失误	(155)
四、北移到底走哪条路线好？	(163)
第七章 血洒皖南	
一、国民党军阴谋策划、子弹上膛	(173)
二、子弟兵挥泪告别父老乡亲	(182)
三、茂林枪声	(191)
第八章 拼死抵抗的日日夜夜	
一、攻打星潭和百户坑会议	(195)
二、高岭和高坦激战	(199)
三、生死搏斗中的项英和叶挺	(203)
四、石井坑守备战	(212)
五、叶挺临危受命谈判被扣	(217)
六、《渔光曲》作者任光倒在叶军长怀里	(222)
第九章 杀出重围	
一、第1纵队的突围	(227)
二、第2纵队的突围	(232)
三、第3纵队的突围	(238)
第十章 委员长陷入困境	
一、变本加厉的逆施，无端控造的罪责	(247)

二、中共的坚决抗议和回击	(256)
三、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枢人士的谴责	(264)
四、人民的愤怒与忧虑	(269)
五、国际盟友反对中国内战	(277)
六、惟有日、伪对事变拍手欢呼	(285)
第十一章 中共中央成功地打退反共逆流	
一、如何反击的艰难决策	(290)
二、周恩来在重庆的英勇斗争	(311)
三、国内外瞩目的国共谈判	(318)
四、委员长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	(331)
五、“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340)
第十二章 项、叶的悲剧	
一、项英、周子昆被害经过	(346)
二、叛徒刘厚总其人及下场	(351)
三、叶挺在上饶、桂林、重庆	(355)
四、叶挺在恩施、桂林、恩施	(364)
五、胜利出狱与黑茶山噩耗	(369)
第十三章 不屈的战士	
一、上饶集中营的英勇斗争	(377)
二、扑不灭的皖南烽火	(385)
三、新四军抗战更加波澜壮阔	(391)
四、皖南事变后部分新四军干部突围后的经历	(398)
结束语	(414)
主要参考书	(418)

第一章 新四军的由来

一、长征后的南方红军游击队

从 1930 年 10 月至 1933 年 3 月,国民党一连对红军进行了 4 次“围剿”,但每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红军不仅未被消灭,反而越“剿”越大。至 1933 年,全国红军从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 30 万人,计 8 个军团另 8 个军,编为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以后红军第 2、6 军团又编为第二方面军。建立了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赣南、闽西、左右江、东江、海南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地的经济、文化也有很大发展。蒋介石不甘心其失败,1933 年 9 月,他亲任总司令,调集 100 万军队,200 架飞机和大批坦克,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红军虽英勇奋战,取得了某些战役的胜利,但由于当时的中共中央完全排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执行了博古、李德等的错误军事路线,进攻时搞冒险主义,防御时搞保守主义,退却时搞逃跑主义;在政治路线上,又执行左倾关门主义,轻视与中间势力福建人民政府的联合,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主力红军 5 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 8.6 万余人,分别自瑞金、于都地区出发,撤离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此后,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也实行了战略转移。这就是历史上英勇悲壮的长征。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留下红 24 师和 10 多个独立团等共 1.6 万余人(加上党政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共计 3 万余人),以掩护主力红军转移、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开展游击战争。在鄂

豫皖等根据地，也留下了部分红军坚持斗争。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①，继续统一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党政军工作。以后又建立了由项英、陈毅、贺昌等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由项英任主席。

蒋介石在命令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长征主力红军的同时，又令陈诚率 20 多个师的部队对留在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军进行残酷清剿，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也克服了种种罕见的艰难险阻，保存了自己的精华，革命根据地的红旗仍迎风飘扬。

至抗战前夕，在南方的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 8 省，共有 15 支红军游击队在坚持斗争。他们是：

赣粤边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以由赣粤、湘赣、湘南、皖浙赣等地的红军组成，活动地区以油山^② 为中心，包括江西的赣县、南康、信丰、大余、崇义、龙南、全南、定南和广东的南雄等地区。游击队领导人有项英、陈毅、贺昌、李乐天、杨尚奎、蔡会文、陈丕显、阮啸仙、刘伯坚等。游击队最初有近 3 万人，在蒋介石重兵的反复清剿下，由于指挥上的失当，部队迅速减员，至 1937 年抗战爆发时，已不足 300 人。

闽赣边游击队。由闽赣军区、瑞金军分区、宁化军分区、长汀与瑞金的红军游击队等组成。活动地区主要在江西的瑞金、会昌、福建的长汀等地。游击队领导人有赖昌祚、刘连标、钟天喜、钟得胜、胡荣佳、彭胜标、刘国兴等。这支游击队最初有 1000 余人，后减少到 30 余人，至抗战前夕有小的发展，共约 300 余人。

闽西游击队。由闽西红军、闽粤边红军、闽赣红军、红军挺进师长征时留下来的余部、以及赣粤边突围红军游击队等组成。主要活动区

^① 中共中央分局的其他成员为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为梁柏台。

^② 油山是赣粤交界处的一座山，属五岭山脉的梅岭。

域在福建的西南部,包括龙岩、上杭、永定、平和、漳平、连城、武平等县。游击队领导人有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万永诚、罗忠毅、方方、邱金声、吴胜、黄火星等。1935年4月,游击区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任军政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郭义为组织部长,方方为政治部主任,朱森为参谋长。部队最初有1500人,1936年秋发展为2000人,至“七七”事变爆发时,部队仍有约1500人。

闽粤边游击队。由原闽粤边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组成。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这部分红军转入游击战争,最初的活动区域在闽南的漳浦、平和、南靖和广东的饶平、潮安、澄海一带,后转至漳浦、云霄边界的梁山及闽南的诏安地区坚持斗争。新建立的靖、和、浦游击根据地,东抵南海岸,南至广东潮安、澄海、饶平边界,北迄漳州城郊,西临闽西游击队。游击队领导人有黄会聪、何鸣、何浚、张敏等。至抗战前夕,这支游击队发展为1300余人。

皖浙赣边游击队。这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先后由原红10军团、皖南独立团、皖赣独立师的红军组成。活动区域为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和浙江省的西北部,包括德兴、乐平、浮梁、婺源、彭泽、湖口、都昌、波阳、祁门、贵池、秋浦(今东至)、东流、泾县、旌德、宁国、宣城等30余县。游击队领导人有关英、唐在刚、余金德、柳真吾、匡龙海、周成龙、王丰庆、熊刚、刘毓标等。1935年初,皖浙赣边游击队有1500人左右;至1936年底,游击队发展至近3000人。1937年春夏,国民党以优势兵力“清剿”游击队,至抗战全面爆发时,尚存300余人。

浙南游击队。这支红军游击队,为原红10军团的挺进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兵力约1000余人。以后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特委回合,1936年秋游击队发展到2000余人。主要的活动区域是浙西南、浙南(含浙东南)、浙东,包括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景宁、庆元、松溪、武义、泰顺、政和、寿宁、福安、温州、台州、衢州、丽水、临海

等 30 余县。1937 年上半年,国民党以 43 个团进攻这支游击队,游击区和部队损失严重。至 1937 年秋,游击队仅剩约 300 人。

闽北游击队。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指示闽北军分区红军第 58 团、闽北独立团、西南独立团、广(丰)浦(城)团及其他游击队在闽北坚持斗争。游击队领导人有李德胜(后叛变)、黄道、王助、黄立贵、卢文清等,部队共 2000 余人。1936 年 2 月,闽北独立师与闽东独立师在闽浙边界的洞宫山会合,两个游击区连接起来。4 月,闽北、闽东两个特委举行联席会议,成立闽赣省委,黄道任书记,叶飞、黄立贵、范式人、吴先喜为委员,统一领导两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部队发展到 3000 余人,主要活动区南抵闽江、北及信江,包括崇安、浦城、光泽、邵武、建阳、建瓯、将乐、顺昌、松溪、政和及江西的广丰、上饶、贵溪、资溪等县。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时,这支游击队还保存 800 余人。

闽东游击队。这支红军游击队主要由闽东特委领导的闽东独立师组成,冯品太任师长,叶飞任政治委员,加上闽东各县的独立营、游击队,总计 2000 余人。主要活动区域包括福安、福鼎、柘荣、霞浦、宁德、罗源、周宁、古田、屏南、寿宁、连江等县。1935 年 2 月,闽东苏区全部被敌人占领,特委也遭破坏,部队损失很大。6 月,叶飞继苏达任之后为闽东特委书记,将游击队编成 3 个团,恢复了部分苏区,并波浪式地向外发展。10 月,刘英、粟裕领导的挺进师主力进到闽东与叶飞会合,成立了闽浙边省委和闽浙边军区,由刘英、粟裕分别任书记和司令员。刘英、粟裕回浙西后,闽东斗争仍由叶飞领导。至 1937 年底,部队又发展到 1300 余人。

湘鄂赣边游击队。这支红军游击队由湘鄂赣苏区的原红 16 师余部和活动在崇阳、通山地区的红军地方武装组成,主要领导人为陈寿昌(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徐彦刚(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傅秋涛(湘鄂赣省委副书记),此外还有涂正坤、邓洪、刘玉堂、谭启龙、钟期光、江渭清等。1935 年 5 月,游击队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取胜,部队由 1100

余人发展到约 5000 人。陈寿昌、徐彦刚在战斗中相继牺牲后，由傅秋涛继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游击队的活动区包括湖南省的平江、浏阳、醴陵、长沙、湘阴、岳阳、临湘，湖北省的通城、崇阳、通山、阳新、大冶；蒲圻、咸宁、嘉鱼、鄂城，江西省的铜鼓、修水、万载、宜春、萍乡、宜丰、武宁、靖安、德安、奉新、高安、上高、永修、瑞昌等地区。国民党于 1936 年 7 月、1937 年春以压倒优势兵力对这支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部队损失严重。至 1937 年 8 月，游击队已不足 400 人。

湘赣边游击队。这支红军游击队由红 6 军团长征后留下的 5 个独立团和湘赣一些县的游击队组成，由湘赣军区领导，领导人为陈洪时（湘赣省委书记）、彭辉明（湘赣军区司令员），最初的人数有 5000 余人。其活动地区包括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茶陵、酃县、攸县、醴陵、莲花、宁冈、永新、安福、萍乡等县。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牺牲惨重，彭辉明不幸牺牲。至 1935 年 3 月，游击队减员不足 1000 人，陈洪时也叛变投敌。1935 年 7 月，原湘赣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联络了 40 多个游击队的干部，在江西莲花的棋盘山举行会议，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由谭余保任省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曾开福任司令员（后叛变），继续坚持斗争。至 1937 年 10 月，部队恢复到近 1000 人。

湘南游击队。这支红军游击队，由红 6 军团长征途中经湘南地区时留下的独立第 5 团、以及当地的游击队组成。领导人为中共湘南特委书记彭林昌。游击队活动区域包括广东的东昌、湖南的宜章、临武、郴县、永兴、耒阳、安江等县。1934 年 11 月，彭林昌在对敌斗争中牺牲，红军营长李林组织 6 名伤员组成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坚持斗争，部队发展到 30 余人。1936 年又遭敌袭击，剩李林等 3 人。至 1938 年游击队集中整编时，已发展到 300 余人。

鄂豫皖边游击队。主要由红 25 军长征后留下的部队组成，即由中共皖西北道委领导的红 218 团、及鄂东北道委领导的独立团，加上其他县的一些游击队，共约 2000 余人。其活动区域在湖北、河南、安

徽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包括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的近 50 个县。主要领导人为高敬亭、方永乐、罗成云等。在根据地遭受敌严重破坏的情况下，1935 年初，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根据省委指示（高敬亭以后任省委书记），以红 218 团和鄂东北独立团为基础，重建了红 28 军，下辖第 244 团、246 团和一个手枪团，全军共 1300 余人，在太湖、宿松、霍山、潜山、英山、舒城一带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敌人的多次重兵“清剿”。至 1937 年春，鄂豫皖边游击区已扩大到东至合肥、庐江、桐城，西到光化、襄阳、宣城、钟祥，南迄京山、孝感、黄陂、黄冈、广济、宿松、望江，北到唐河、确山、潢川、固始、霍丘的广阔区域。同年 10 月，部队集中时仍保存有 2000 余人。

豫南游击队。这支红军游击队由中共河南省委于 1936 年 1 月组建，最初只有 7 个人、3 支枪，活动于信阳、确山地区，主要领导人为王国富、张新江（河南省委书记）。部队在严酷的斗争中，发展缓慢，张新江也在战斗中牺牲。1936 年 8 月，成立了以王国华为书记的新河南省委，总结了游击战的经验教训，队伍得到较大发展，至 1937 年春，游击区已扩大到纵横各 200 余里、中心区纵横各 100 里的范围。游击队也发展到 100 余人，称鄂豫边人民抗日军。

琼崖游击队。这支红军游击队由原琼崖苏区的工农红军独立师余部组成，最初只有数十人，领导人为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海南岛的琼山地区。1936 年，游击队发展到 100 余人，成立了琼崖红军游击司令部，朱克平任司令员，王伯伦任政治委员。1937 年，相继恢复了琼崖地区的工农民主政府和琼山、文昌、儋县、澄迈、临高等县的民主政权。至“七七”事变时，游击队已发展到 300 人。

闽中游击队。其活动地区包括莆田、福清、仙游、惠安、永泰、闽侯等县。游击队为闽中特委领导，主要领导人有王于洁、刘突军等。游击队从 1934 年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爆发，斗争十分艰苦，领导人相继牺牲。至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时，约剩 200 余人。1937 年 3 月，

发生“泉州事件”，游击队大部被缴械，经交涉，退还的人枪，编入新四军特务营。

南方8省15支红军游击队所进行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二万五千里长征比较，它“同样辉煌昭亮”^①。这15支游击队保存的1万余人，是南方红军的精华，他们的英勇斗争，掩护了中央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坚持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新的民族解放战争保存了力量，“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②毛泽东也说：“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二十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③

二、“持枪倚枕到天明”——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岁月

南方红军游击队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以后，激烈的军事斗争随即开始。

中共中央在离开中央苏区前夕，给项英等的任务是：“保卫苏区”，“保卫土地政权”，抗击敌人对根据地的进犯，破坏敌人对苏区的统治，等待、并准备配合主力红军的反攻。其作战方针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使“游击战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避免“与敌人进行阵地的硬拼的战斗。”为此，党应“改变自己的组织与工作方式”，党的各个组织“应该立即缩小机关”，把大批干部和非必需的工作人员派到游击队、游击组及地方工作中去。中央还指示，要发展游击战争，“必须依靠群众”，“必须在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中去武装群众”，以扩大武装，“必须用一切力量动员群众起来，……进行坚壁清野”，

① 方方“《三年游击战争》1948年8月1日。《红旗飘飘》第18辑第147页。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1937年12月13日。《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

③ 《方方》，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